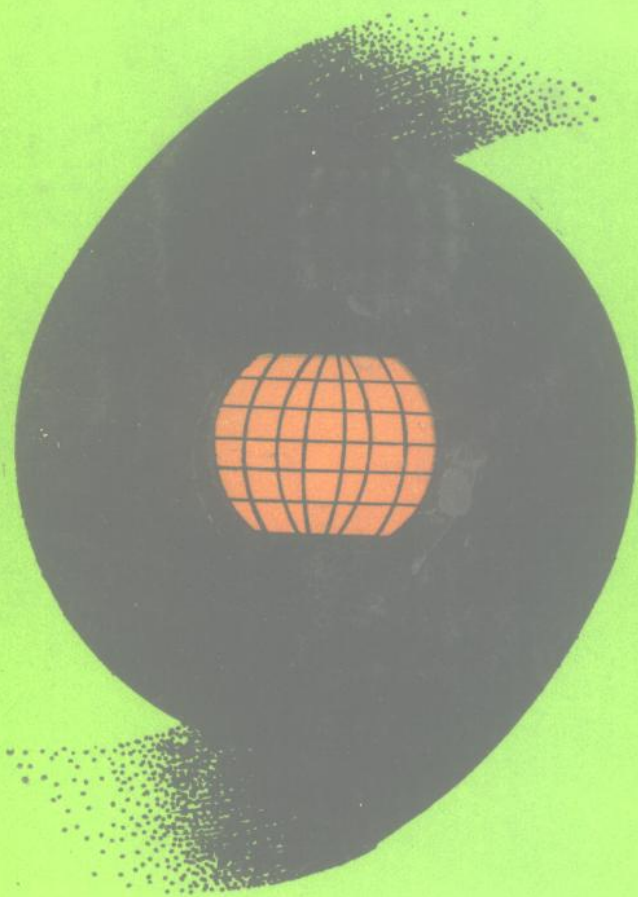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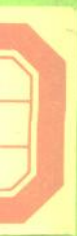


近代东北亚 国际关系史研究



崔 丕 / 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

崔丕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吉) 新登字 12 号

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

JINDAI DONGBEIYA GUOJIGUANXISHI YANJIU

崔 丕 著

责任编辑：侯文富 封面设计：王 帆 责任校对：魏芳华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 110 号)

吉林农业大学印刷厂制版

(邮政编码：130024)

吉林农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2 年 5 月第 1 版

印张：13.75

199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75 千

印数：0 001—1 500 册

ISBN 7-5602-0782-0

定价：(平) 4.15 元

K · 61

(精) 10.00 元

国家教委哲学社会科学青年
研究基金项目 (1987 年)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

——序《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

薛 虹

《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在众多的国际关系史的著述之中，确实是一部艰辛的开拓之作。

这部书稿所以是艰辛的开拓之作是从两层意义上讲的。我们知道，自从本世纪始中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中的著作，几乎都是以外国人的著作为蓝本编译的。这部书稿不同，它是立足于中国的视角，不将中国看作是国际关系中的被动客体、只叙述各资本—帝国主义强国的国际外交活动对中国的作用，而是研究阐明中国外交政策在国际政治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尤其是注意东北亚国际政治形势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作用。总之，这是一部中国的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这是第一层意义。我们还知道，国际关系史研究向来是以西欧为中心，连国际政治区域的命名都是站在西方的角度向东看，分作近东、中东和远东。这部书稿不同，它是将“东北亚”作为一个国际政治区域的通史之作的**第一本，它所持的观点是东北亚的国际政治关系和欧洲的国际政治关系是相互影响的，不再沿袭东北亚国际政治关系“是由欧洲决定的”的传统立场，这是第二层意义。

从这两层意义上说，用《左传·宣公十二年》的一句话“筭路蓝缕，以启山林”来比喻这部书稿在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并非夸张的过誉。

将“东北亚”从“远东”的范围中区分出来，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国际政治关系的区域范围，始见于本世纪的70年代。1975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R·A·斯卡拉皮诺(R·A·Scalapino)的著作《亚洲及其前途》(加州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中首次将东北亚作为一个国际政治关系区域(第10—12页)使用。其后，这位教授在同一出版社出版了题为《东北亚与大国关系》(1987年版)仅有71页的专著。它仅仅专论了本世纪80年代美苏中日四大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政策及其相互关系。这算是西方学术界将东北亚作为一个国际政治区域加以研究的第一本著作。这本专论出版5年后，摆在读者面前的崔丕同志撰著的这部《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问世，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部完整的近代东北亚国际政治关系的通史。

为什么要把东北亚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国际政治区域呢？

本书作者认为：“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发生，是由俄国向东北亚的扩张而引发的”(见本书第40页)。这是在历史分期上同前此的远东国际关系史完全不同的新见解。

在17世纪中叶沙俄侵略扩张势力到达东北亚以前，东北亚不能构成相对独立的国际政治关系区域。自秦汉以来近2000年间东亚的国际政治关系，基本是以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为中心同其周边国家建立的宗藩或朝贡的国际关系，这是封建国家同封建国家或同前封建国家的关系，其地理区域遍及东亚和中亚，是中世纪时期几大世界历史舞台之一，并不局限于东北亚。

到16世纪80年代，沙皇俄国政府受俄国商业资本的驱使，派遣和支持哥萨克武装匪帮向东方扩张、越过乌拉尔山脉，60年间便席卷了整个西伯利亚。俄国殖民者每到一地，强征毛皮税及各种金属器物和粮食，其殖民掠夺的前锋东到鄂霍次克海沿岸，东北达堪察加半岛，东南抵黑龙江流域，从而揭开了中俄和日俄外交的序幕。这也是一次世界性的“地理大发现”。

“地理大发现”通常指的是人们熟知的15世纪末西欧人的海上探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地理大发现的描述是：“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①。正是由于地理大发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的海外殖民掠夺，才成为西欧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手段和历史过程。

晚于海上“地理大发现”约一个多世纪的北方陆上的“地理大发现”是由俄国席卷西伯利亚始，环北太平洋沿岸和对北美洲的殖民掠夺和贸易而完成的，同样是俄国进行原始积累的主要手段和历史过程。沙皇保罗一世批准于1799年成立的俄美公司同荷兰、英国等的东印度公司是同一性质的海外掠夺贸易的垄断公司。如果说葡萄牙、西班牙、英国和法国的海外掠夺开辟了南美洲和西南太平洋地区国际政治关系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那么，俄国扩张势力闯入东北亚或环北太平洋地区，改变了原来的封建国家间的单一的国际政治关系格局，开始有了近代性质的国家政治关系，就应该看作是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发端。

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区域，从其地域范围来说包括朝鲜半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2页。

中国的东北地区（含内蒙古东部）和华北地区、东西伯利亚、阿留申群岛、堪察加半岛和千岛群岛，即整个环北太平洋地区。近代东北亚国际政治关系在地域上的发展趋向，是由北部边缘地方向南部腹里地带发展。东北亚作为地缘的政治区域，只应是模糊的泛指，不应求其明确的绝对界限。本书作者认为中国的东北地区是“东北亚的腹里心脏”，朝鲜半岛也曾较长时期是东北亚国际政治关系的焦点。日本原本也应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侵略的焦点，但是由于明治维新，日本迅速发展为资本主义的侵略国家，反而跻身于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强国的行列。

自17世纪中叶起沙皇俄国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是起着主导作用的，黑龙江畔的腥风血雨、对日本的“北寇八年”、在千岛群岛、堪察加和阿拉斯加的殖民化，都是俄国的扩张侵略的结果。到19世纪70年代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的斗争，则是日本居于主导地位，斗争的实质是日本要将朝鲜变为其殖民地和中国要维护传统的中朝宗属关系之争。自此时起，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便成为东北亚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部位。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其后，中国的东北地区则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焦点。19世纪70—90年代日本在朝鲜半岛的进攻和中国的反对，终于导致了中日甲午战争。

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以后，沙皇俄国在东北亚国际政治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在甲午战前俄国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表明其战略重点东移。甲午战争结束，组织“三国干涉还辽”，此后10年间，日俄两国在朝鲜、中国东北地区的矛盾和斗争成为东北亚国际政治关系的中轴，英、美、德、法等资本—帝国主义强国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进来，纵横捭阖，纷纭万端。在这期间，“俄国推行的帝国主义霸权政策，在东北亚国际形势朝着战争方向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第14页），“俄国政府外交活动所采用

的方法和手段以及企图实现的纲领，都是‘进攻性’的，这一政策在日俄冲突的发展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第 223 页）。日俄战争前，俄日争夺的主要目标是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权益，俄日战争结束后分割的也是中国的东北地区。

日俄战争结束后，东北亚的国际政治关系集中在国际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东北的角逐，并日趋向山海关内的华北发展。而其轴心是日俄协约联合垄断中国东北地区和美国资本积极渗入的斗争及其日益尖锐化。“‘满洲成为远东的巴尔干’，指的就是这一时期的形势”（第 15 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日本和美国在东北亚扩张侵略势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旨在独占中国，而美国则企图运用其雄厚的资本遏制日本的扩张。日美共同出兵西伯利亚干涉俄国革命，争夺的是西伯利亚铁路和中东铁路，“中东铁路路区成为东北亚国际政治斗争的焦点”（第 18 页），而日美在东北亚的对抗正向中国全局的方面弥漫。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中国东北自 19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直是东北亚国际政治关系的焦点。缘于此，“作为炎黄子孙”的作者，才以“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政策对中国东北社会变迁的影响”为题，撰写了本书的结语。

作者认为 1922 年的华盛顿会议“是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的终结”，这也是国际政治关系史分期问题上的新提法。

将华盛顿会议看作是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终结的标志，其理由：首先是因为从此次会议起日本同美国的长期对峙，成为东北亚国际关系的轴心。其次，由华盛顿会议签订的诸条约构成的华盛顿体系，虽然完全排斥中国和新建立的苏联，但是不久苏联利用日美矛盾先后同中国和日本签约，正式出现在东北亚的国际政治斗争的舞台之上，这样，东北亚国际关系冲破了资本—帝国

主义国际政治体系，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间的关系之复杂格局。再次，英、法、德等国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的势力大为削弱，此后的东北亚国际关系基本是美、日、苏、中四大国间的关系史。此外，我认为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向，那就是明显地突破东北亚的区域范围，日美两国的战略目标向全中国、进而向西南太平洋区域发展的趋向，东北亚国际政治关系区域之相对独立性日益缩减。

根据上述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的时空范畴，我以为这就是所以要把东北亚看作是近代国际政治关系的相对独立区域的理由。

本书作者撰写这部书稿的指导思想之一，是“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我们研究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点，是应该揭示东北亚国际关系的进程对我们这个民族社会变迁的影响”（第386页）。这一点使本书比过去的远东国际关系史的著作前进了一步。

我们知道在国际政治关系史研究领域，进步的左派史学家强调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外关系史的基本特征是扩张，其所以不断扩张的根源在于社会经济制度。在苏联曾经被严厉批判过的波克洛夫斯基学派和欧美、日本的许多史学家，都以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为主旋律阐述远东政治关系史的发展过程，揭露它们对中国和朝鲜的国家主权的侵犯和损害。持相同立场的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们的“帝国主义取向”观点，也是以为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是中国百多年来社会崩解、民族灾难、无法发展前进的祸根。

本书不仅仅停止在揭露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着重对

东北地区)和朝鲜的国家主权的侵犯和损害,其前进一步之处在于提出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社会形态的强制性改组”的概念(第389页)。在本书结语部分,以“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政策对中国东北社会变迁的影响”为题,简明地论述: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地区所“奠定”的西方式社会转变的“物质基础”的某些特征和属性;这些“物质基础”又赋予了中国东北地区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以哪些特点;并且阐明中国东北地区社会变迁的趋向不可能是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第386—397页)。作者并且认为这种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社会形态的“强制性改组”,“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连锁运动”(第389页)。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提出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双重使命的论点。他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①。这部书稿堪称是一个半世纪以来将这一经典论点结合中国实际,在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加以具体阐发的嚆矢。

前面我已经提及持欧洲中心论的史学家在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中,向来是将中国视为国际关系中的被动客体,忽视中国外交活动的作用和影响。本书立足于中国的指导思想之另一表现,则是比较注意揭示中国外交政策及其活动在东北亚国际政治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

1685—1686年的中俄雅克萨战争及作为这个战争的结果——1689年中俄两国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在东北亚国际政治关系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沙皇俄国的哥萨克匪帮自从越过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

拉尔山脉闯入亚洲，席卷西伯利亚，追取毛皮税如入无人之境，当其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的黑龙江流域，妄图南进之时，由于《尼布楚条约》的签订遏制了俄国对黑龙江流域的进一步侵略，使清朝东北边疆获得了大约一个半世纪的相对安宁，将俄国的侵略方向逼向东北方，越过白令海峡，深入到北美洲。这是中国在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上的一次巨大的影响。

在东北亚国际政治关系史研究中，必须阐明清朝政府的“以夷制夷”外交政策的制定、实践及其作用，这是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上持续时间很长并且影响国际形势的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夷制夷”，即利用国际关系上的矛盾，联合、利用或依附某国来对抗另外的国家，谋取实现自国的外交目的，本来是各个国家莫不采取的外交手段。在清朝政府形成为一个长期的固定的外交政策，则是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其根源在于国家积弱，在国际社会中无力自立，才不得不“饮鸩止渴”，谋求避重就轻，利用或倾斜、甚至于依附某一外国，靠牺牲一些主权，反对另一外国的侵略和压迫。这种外交挣扎，不能简单地斥之为甘心为奴，蓄意卖国。本书作者对这种外交政策历史作用的评价是“每一次努力和挣扎的结果，虽然暂时获得了延续其统治的国际力量，但又无法从根本上缓解所面临的危机”（第3页）。外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从来不被侵略国家的外交活动及其影响纳入国际政治形势之中，这样很难准确把握国际形势的复杂性。

清朝政府“以夷制夷”外交政策的倡导者、制定者和执行者都是李鸿章。这一外交政策发轫并形成于1885年。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一直用朝鲜独立问题，作为其在朝鲜半岛推行殖民政策的借口，而清朝政府坚持保存中朝的宗藩关系、保存朝鲜的封建社会制度。由于此，中日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朝鲜半岛成为东北亚国际政治关系的焦点，俄、英皆卷入朝鲜半岛的争

端。在这样的国际关系中，1885年李鸿章提出联俄拒日的外交政策。李曰：“韩虽可虑，有俄在旁，日断不遽生心。我当一意联络俄人，使不侵占韩地，则日亦必缩手”（第112页）。自此时起，清朝用这条外交政策对付日本。到中日甲午战后，三国干涉还辽，和沙俄签订1896年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成为清朝政府的外交总方针，直到李鸿章在《辛丑条约》签订后死亡。俄国利用清朝这一依附的外交政策，竭力扩大其在华的利益，在八国联军侵华过程中出兵占据中国东北地区，顽固地拒绝撤兵，清朝政府前后推行十六七年的这条联俄外交政策才彻底破产。这十六七年间清朝政府依靠这一外交政策虽然暂时渡过一些危机，最终陷入濒临被瓜分的困境。李鸿章死后，清朝政府在对俄从东北地区的撤兵交涉过程中，实行的仍然是“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1902年4月中俄签订的《交收东三省条约》，1903年6月清政府拒签沙皇破坏撤兵协定提出新的七项要求，都是利用日英的国际压力，而又主要是倾斜于日本来对付俄国的，这在当时确实一定程度上保全了主权，当然日后给日本提供了可乘之机。清政府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出让铁路建筑、森林矿山的开采、设厂等权益、借款等都有一个倾斜和依附的关系问题，清朝在国际关系中的倾斜和依附，都影响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调整外交政策，导引国际政治关系的组合和排列的改变。

中国北洋政府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对苏俄的外交政策，采取“与协约国一致”的原则，这件事在国际政治关系史著述中多不涉及，在中国近代史的表述中则多是简单地看作是段祺瑞政府对日本的屈从卖国行径。这部书稿中没有这样简单从事，而是分析了北洋政府企图利用沙俄垮台，日美矛盾，“派军进驻中东铁路路区，依次收回护路权、行政权、司法权和最高监督权”（第18页，详见第366—367页）。这是历史主义的实事求是的见解。我以为

这部书稿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国际关系历史背景来看，会有许多论点将要干预中国近代史上的传统看法。

上面所介绍的是这部书稿与“欧洲中心论”者或者是“帝国主义取向”观点上不同之处，也就是立足于中国的视角特点的主要表现。

当代国际政治关系史的研究领域中，立足于为本国政府辩解的国家主义立场的著作很多，无论是欧美还是日本。尤其是苏联的远东国际关系史和俄国外交史的著述中，持这种立场和观点的占据主流地位，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60年代末长期地对中国历史学界有比较大的影响。持这种立场和观点的著述中为沙皇俄国的辩解主要是：

——本来沙俄是17世纪40年代起对东北亚的扩张和侵略的始作俑者，正是沙俄的哥萨克匪帮在黑龙江流域对中国居民进行了血腥的残暴掠夺。而这些著作中却描绘为给当地土著带来了“文明的曙光”。

——19世纪40年代，沙俄政府处心积虑地要夺取中国黑龙江航行权，寻求东方出海口，连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都承认：只有取得黑龙江航行权，“才能占据西伯利亚、保卫堪察加和鄂霍次克海，使其永属俄国版图”，并且“分享太平洋的国际利益”（第73页）。可是在这些著作中却说成是为了保卫俄国东方领土不被英法侵犯，甚至说是为了同清朝共同防御英法。

——利用英法联军进犯中国之机，强迫清朝签订中俄《璦琿条约》、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割取中国东北和西北的大片领土。但在这些著作中则称之为“收复失地”。

——甲午战争以后，沙俄在东北亚的霸权主义政策的进攻，在推动日俄战争的爆发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些著作却把沙俄政府说成是被迫的不得已应战，似乎是日本将战争强加给沙俄方

面的。

——沙俄在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中国的义和团反帝运动中是主要角色，尤其是趁机出兵中国东北地区，企图一举吞并东北，并通过控制李鸿章而控制清朝政府。像这样重大的东北亚国际关系全局的问题，在这些著作中仅仅解释为为了保护俄国侨民免受义和团的杀害。

——日俄战争结束后，沙俄政府改变外交政策，主动地联合日本，瓜分中国东北地区为这两国的势力范围，俄国为“北满”，日本为“南满”，排斥美国的侵入，并且凭借日俄三次协约和四次密约，对中国实行强硬外交政策，不断制造事端：如修订中俄商约、策动外蒙古独立等。在这类著作中总体上是讳莫如深，对肢解蒙古则描绘为扶持弱小民族的独立运动。

举凡这些苏联国家主义史学中对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的重大曲解，在本书中均有如实的叙述和恰当的评价。我以为这也是这部书稿的一大特色。顺便想提出的是，这部书稿对沙俄在英法联军侵华战争期间及战争结束后中国和英、法、俄、美等国签订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过程中的活动应该多加些笔墨，这时期沙俄政府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冒充调停人，居间讹诈、趁机勒索的种种活动，应该有透彻的揭露。还有沙俄在策划八国联军侵华以及战争过程中的纵横捭阖，庚子议和过程中控制李鸿章、企图操纵签约等也应该作出具体的叙述和分析。我以为这两个问题虽非局限于中国东北但仍然是属于东北亚国际政治关系范畴内的重大事件。

在中国长期间有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那就是认为俄国在国际政治关系中其战略重点始终是在欧洲。在这部书稿中作者并没有持这种观点。而是实事求是地叙述了沙俄政府在19世纪中的对外政策重心的两次向东方转移：一是在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失

败，俄国在欧洲受挫，其对外政策重心和国际政治关系中的战略目标东移，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攫取包括中国东西两面大片领土的许多重大权益，不仅得到在欧洲损失的补偿，又加强其自身的力量，再返回欧洲一逞雌雄。还有，19世纪80年代，俄国在近东巴尔干地区和中亚地区打通出海口的企图，皆遭到英国的阻挠而失败，于是俄国不得不再一次将其对外政策重心东移，企图以东方的胜利改变其在欧洲列强中的不利地位。1887年沙俄政府决定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便是其战略目标向东转移的标志。直到日俄战争结束，其国际政治关系中的战略目标，始终是推行称霸政策而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采取了进攻的姿态。随着西欧战云日趋弥漫，沙俄的战略目标才西移，在东北亚联合日本，除了为保持并扩大它在东方的既得权益外，还有为了保证其在西欧战场上的争夺而无后顾之忧。本书作者在“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方法”一节，提出“注意东北亚国际关系与欧洲国际关系的相互影响”（第7页），强调“把握欧洲国际关系与东北亚国际关系的互动作用”（第8页）。此书稿对沙俄政府的两次对外政策重心东移到东北亚的叙述和分析，正是这种“互动作用”方法论的具体体现。

另外，这本书特别重视“系统地研究有关各国的对外政策”。因为“对外政策规定国家外部活动的基本方向和基本目的，以及国家外部活动的方法和手段”（第4页）。国际政治关系主要是有关国家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的综合产物。在国际政治关系的研究领域中，追踪重大政治事件有关国家的外交政策及其实践，不仅有助于动态的叙述国际政治关系，更有助于探求其变化过程或其源头，加深研究的深度。本书的作者利用了大量的外交档案，如在叙述中日马关条约时着重探讨日本方面关于马关条约约稿的版本和形成过程；又如发掘对日俄战后美国远东政策的起源及其影

响；再如，追寻德国在英日同盟形成过程中的政策；日俄战后在日俄三次协约和四次密约签订过程中两国的外交政策，以及俄国对外政策的不断调整；1915年日本对中国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的形成过程和各国要求在整个中的地位，莫不是采取研究有关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才使研究深化，获得某些新的见解。

还有，这部书稿作者在研究方法上提出“研究各国对外政策的动因和对外政策在决策上的实际过程”，皆“取决于国家的直接利益”的论点。作者不赞成简单地教条地对待“国家阶级性质决定其基本对外政策”的论断。在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上简单的阶级分析，其实质是“阶级斗争为纲论”的延伸。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阶级属性在很长的时间都是不变的，但是，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则是经常变化的，化敌为友、反友为敌的现象在国际关系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举凡这些都无法用阶级属性作单一的解释。本书作者强调“国际力量的分聚离合的主要根据不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而是国家利益”，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国家的现实利害。只有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现实的实力地位才是决定外交政策的直接客观依据。国际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瞬息万变的政治现象，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经济制度、政府的组织形式、政治集团的不同，甚至某些决策人的意志都足以影响对外政策和外交实践，再影响于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化。所以说不能用国家的社会制度的性质作为“标签”来直接简单地对待国际政治关系中的是非曲直。作者的这一观点，并不是否定国家的属性及其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是决定对外政策和外交活动中的长远的基础因素，而是避免公式主义地将复杂的国际政治关系简单化、标签化、脱离客观实际，不利于研究的深入。关于这方面的事例，我在这里是难以例举的。